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宏观经济 发展问题研究

田 雪 原

人口对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今年7月世界人口闯过50亿大关，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在我国，由于人口多、底子薄构成基本国情中的最主要特点，人口对发展影响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然而人口除数量、素质这些基本的方面以外，人口的年龄构成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却颇值得重视的重要因素，应当开展广泛深入地研究。本文力图从分析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入手，对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几个问题，作出一些探讨。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回顾和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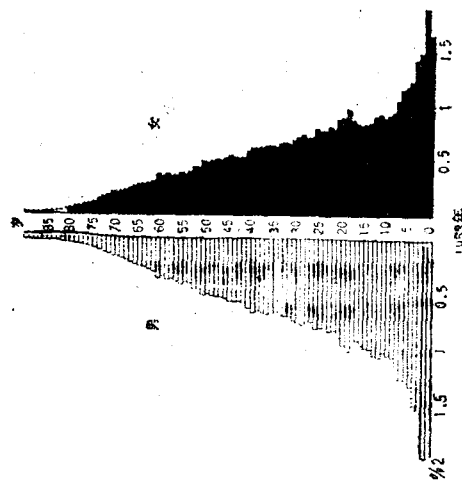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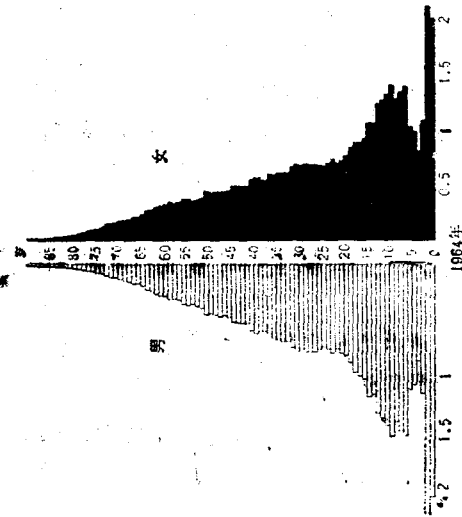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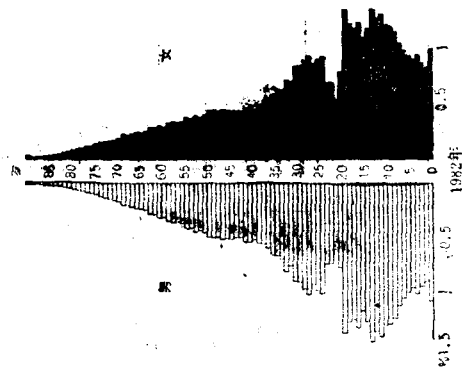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是由历年出生人数依次加入总体人口，年龄别死亡人数分别退出总体人口，移入和移出人数按其年龄加入或退出总体人口三个基本因素决定的。不过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移入和移出人数不多，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主要是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决定的。考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人口出生和死亡的变动情况，出生率除1958—1961年特殊时期外，整个50和60年代保持在32%—43%的高率进入70年代以来显著降低，由1969年的34.11%下降到1979年的17.82%，10年间下降近一半。80年代开始有升有降，大致在18%上下波动。人口死亡率除1958—1961年特殊时期外，总的趋势是下降的，并在70年代以后基本稳定在6%—7%的水平；年龄别死亡率总的趋势也是下降的，尤以婴儿死亡率下降最为明显。出生和死亡的这种演变，直接决定着总体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以1953、1964、1982年三次普查为例，年龄结构演变的趋势如以下三图所示^①：

以上三图表明，1964与1953年人口年龄金字塔比较显得更为年轻化：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36.3%上升到40.4%，15—64岁比例由59.3%下降到55.9%，65岁以上比例由4.4%下降到3.7%。这种年轻化的趋势持续到70年代初期。1982与1964年人口年龄金字塔比较则变化很大：金字塔底部明显收缩进来10多个年龄组，0—14岁人口所占比例下降到33.5%；成年人口中除35—39岁和40—44岁所占比例略有下降外，15—64岁人口比例上升到61.6%；金字塔顶端加厚起来，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上升到4.9%，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向着老龄化方向发展。

^①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6》，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

全國人口年齡構成



迄今为止,人口学家关于按年龄构成区分的不同人口类型的标准,不尽统一。较早的瑞典人口学家桑德巴的“三分法”,老年人口比例是以50岁为起点计算的。其后波兰人罗塞特提出60岁以上作为老年人口年龄起点,并细分为接近老年型、开始老年型、完全老年型的不同比例。联合国规定的标准是二重的:年轻型为65岁以上人口占4%以下,或60岁以上占7%以下;成年型为65岁以上占4%—7%,或60岁以上占7%—10%;老年型为65岁以上占7%以上,或60岁以上占10%以上。近年来,一些人口学家以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5%以下、5%—10%和10%以上作为划分三种类型的标准,日本大学黑田俊夫则提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7%以下、7%—10%和10%以上的新标准,以适应当今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客观形势。我以为,从我国人口年龄构成的实际情况出发,参照国际上的一些划分标准,目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年轻型末期与成年型初期之间,其基本特征是:一方面年轻人口所占比例大,1982年普查年龄中位数只有22.9岁,具有较强增长势能;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态势已初步形成,将以比较快的速度达到老龄化较高水平。未来总体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参见下表①:

年 份	低位预测(%)			中位预测(%)			高位预测(%)		
	0—14岁	15—64岁	65岁以上	0—14岁	15—64岁	65岁以上	0—14岁	15—64岁	65岁以上
1990	24.6	69.6	5.8	26.0	68.4	5.6	27.1	67.4	5.5
2000	21.9	70.9	7.2	24.3	68.8	6.9	25.7	67.5	6.8
2010	20.1	71.7	8.2	20.7	71.4	7.9	21.2	71.2	7.6
2020	19.8	69.0	11.2	20.8	68.6	10.6	21.5	68.3	10.2
2030	19.2	66.4	14.4	20.1	66.4	13.5	20.6	66.5	12.9
2040	19.3	61.9	18.8	19.3	63.3	17.4	19.5	64.0	16.5
2050	20.1	62.6	17.3	20.5	63.5	16.0	20.8	63.9	15.3

上表表明,至2040年以前0—14岁少年人口所占比例是逐步下降的,中位预测下降到19.3%,比1982年普查时降低14.2%。15—64岁成年人口所占比例先升后降:中位预测由1982年的61.6%上升到2010年的71.4%,然后下降到2040年的63.3%。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逐步上升,中位预测由1982年的4.9%上升到2040年的17.4%,上升的幅度很大,老龄化发展比较迅速。

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固然首先应着眼于总体人口,但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年龄结构上的差异,也应受到重视。1982年普查,全国0—14岁人口所占比例以乡村为最高,占35.37%;其次为镇,占28.31%;市最低,占26.01%。15—64岁成年人口所占比例则倒了过来:市、镇、县分别为69.31%、67.48%、59.63%。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依次为县占5.00%,市占4.68%,镇占4.21%。这是就全国市、镇、县总水平说的,就个别情况说,最大城市上海市老年人口比例当居榜首,北京市和天津市也名列前茅。从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异上看,年龄中位数可以反映人口老化或年轻化的程度,1982年普查的情况是:全国为22.91岁,最高的上海市为29.23岁,其次北京市为27.20岁;最低的宁夏为18.42岁,其次青海为18.54岁。②大体情况是:人口密度较高、出生率下降较快的地区,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相对为高,

①参见《2000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田雪原主编,邬沧萍、鲁志强副主编)。

②资料来源:《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

年龄中位数偏高；人口密度较低、出生率下降较慢的地区，年轻人口所占比例相对为高，年龄中位数偏低。这就形成了大致同人口的地理分布相对应的年龄构成上的差异：自西北向东南年龄中位数、老年人口所占比例逐渐增高，人口老龄化程度成阶梯式分布。

生产年龄人口变动和就业发展战略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是经济生产年龄人口的变动对就业发展战略的影响问题。因为从人口角度说，生产年龄人口比少年人口、老年人口都多，所占比例最大；只有这部分人才真正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他们不但生产自身消费的财富，还要生产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消费的财富，在总体人口中是处于核心和支配地位的人口。从经济角度说，生产同交换、分配、消费比较起来不能不居于首位，不仅决定着可供交换、分配、消费的物质内容，而且决定着交换、分配、消费的性质和方式。因此，就业主要作为一端把人口中的核心部分同另一端生产这个关键环节联系起来，体现着人口和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实质。其发展战略的确立，显然必须顾及到这两个方面的情况。

未来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的变动趋势已如上述，以中位预测为例，所占比例一直要上升到2010年左右。其绝对人数的增长时间还要长一些，可由1985年的6.83亿增加到1990年的7.65亿，2000年的8.58亿，2010年的9.56亿，到2015年达到最高峰值时可达9.80亿；然后缓慢下降，2020年下降到9.77亿，2040年下降到9.30亿。即在未来的30年内生产年龄人口，从而劳动力的数量是要大幅度增长的，大致比目前增加3亿人。其后生产年龄人口数量虽有减少，但在2015年以后的又一个30年内，也保持在9.3亿以上，比1985年多出2.5亿人。生产年龄人口如此迅速膨胀，从供给方面给劳动就业施加巨大影响，提出了新的课题。考虑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在发展战略上，应当着力实现就业战略重点的转移。

首先，实现由以农业栽培业为主向以多种经营和城镇工商业为主的就业战略重点的转移。30多年来，我国新增人口就业一直以农业为主，农业中又以农业栽培业为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种状况虽然有所改变，但直至1985年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的劳动者人数超过31 187万，占全部社会劳动者人数49 873万的62.5%。其结果是农业特别是农业栽培业劳动生产率低，每个农业劳动者占有的耕地面积大量减少，1982年比1949年减少一半，目前进一步减少。粮食总产量增加很多，每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却增加不多；农业产值增长不算慢，每个农业劳动者提供的净产值总的看来增长不快。按照前面的中位预测，2000年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将比1985年增加1.75亿人，2010年增加2.73亿人，如象过去那样主要都面向农业，一半以上面向农业栽培业，无论如何也是行不通的。我们应当做到使每年新增加的生产年龄人口不再进入农业栽培业，并应有计划地转移一部分出来。转移的途径之一，是栽培业向多种经营的转移。我们具备这样的条件：144亿亩土地中高原和山地（一部分为高山牧场）约占59%，盆地和平原约占30%，丘陵约占9%，淡水面积约占2%，具有发展林、牧、副、渔的良好条件。转移的途径之二，是发展乡镇工商业，加快人口城市化的进程。近年来江浙一带乡镇工业蓬勃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说明不仅是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效方式。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农业现代化过程

中，以栽培业为主的农业劳动者不仅相对减少，甚至绝对数量也大为减少。1955—1975年美国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人数减少近一半，日本减少一多半，其他发达国家也都经历了这一过程。目前法国、联邦德国等国家从事农业人口的比例已下降到占不足10%，美国、英国等更下降到占3%以下，农业人口转移仍在加速进行着。我们要解决未来大量新增人口就业问题，非走人口城市化的道路不可，目前要大力发展小城镇，繁荣城镇工商业。

其次，实现由以工农业物质生产部门为主向以非物质生产部门为主的就业战略重点的转移。多年来，我国商业饮食服务业、科教文卫等非物质生产部门就业人数的增长不快，加上一半以上新增生产年龄人口进入农业，这就造成了物质生产部门职工人数增加过多，所占比例过高，而非物质生产部门职工增加过少，所占比例过低的局面。结果某些生产部门和企业本来人员已经饱和还要继续加人，形成人浮于事，生产效率不高。而这种效率不高的技术构成比较低的企业，吸收劳动者的弹性较大，似乎可以凭着主观意志随意增加人。这样做的结果又严重地妨碍了新技术的采用，堵塞了走内含扩大再生产的路子。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今后大量新增生产年龄人口就业主要不应面向生产，而应面向服务行业，面向第三产业。这也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发达国家物质生产领域与服务行业就业人数之比达到1:1左右，英国达到1:1.5，美国达到1:2.3，“白领职工”大有超过“蓝领职工”之势。面对今后数十年内我国生产年龄人口大幅度增长的态势，实现向以非物质生产部门为主的就业战略重点的转移，不仅是解决新增生产年龄人口就业的需要，也是提高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和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

再次，实现由以提高就业率为主向以提高就业效益为主的就业战略重点的转移。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多就业的政策，一方面高就业反映了劳动力资源得到比较多的利用，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另一方面又暴露出高就业背后劳动力实际利用率不高，就业效益比较差的矛盾。以全民所有制工业总产值的增长为例，“一五”、1963—1965年和“五五”三个时期产值的增加主要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取得的，“二五”、“三五”和“四五”主要都是依靠增加劳动者人数取得的，“二五”、“三五”还出现了劳动生产率的负增长。这是造成多年来以增加劳动量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提高生产效率内含扩大再生产受到压抑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鉴于未来二三十年内生产年龄人口还有一个猛增的过程，就业压力有增无减，就业率和就业效益的矛盾将更为突出。总的指导思想二者应当兼顾，针对以往更多强调充分就业，不同程度的忽视就业效益的倾向，在战略上有一个向着以提高就业效益为主的转变问题。在充分就业、比较充分就业、合理就业、不充分就业等战略抉择中，我倾向于比较充分就业和合理就业。即在保证就业效益不断提高，至少是保证不降低的条件下，尽量扩大就业面，达到尽可能比较充分的就业。不顾效益与否只是一味的强调充分就业，或者无视生产年龄人口猛增的事实片面强调就业效益，都是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不相协调的。

老龄化趋势和老年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宏观经济发展战略问题，除生产年龄人口和就业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值得重视外，老年人口变动和老年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又一个方

面的问题。前面三种预测中老龄化程度不尽相同,但在未来的60多年内老年人口绝对数量是相等的,因为这些人已按年龄分布于0岁组以上各年龄组,只要每年扣除年龄别死亡人数并作人口年龄推移,便可得到每年的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如果以1982年普查65岁以上老年人口0.5亿为起点,28年后即2010年可翻一番,将超过1亿;再过20年后再翻一番,2030年可达2亿;到2040年达到最高峰值时可达2.6亿,即比1982年净增2亿老年人口。还应提出的是,不仅总体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加深,而且老年人口中超老龄化,或者老年人口的进一步老龄化发展也颇为迅速。这里我应用人口年龄中位数的计算公式:

$$X_{md} = X_i + \frac{\frac{\sum P_x}{2} - \sum_{0}^{md-1} C_x}{P_{md}} \cdot d$$

计算出老年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中位预测60岁以上老年人口年龄中位数的变动,可从1982年的67.6岁提高到1990年的67.7岁,2000年的68.3岁;2000年后略有下降,2010年可下降到68.2岁,2020年下降到67.9岁,2030年下降到67.8岁;2030年以后迅速上升,2040年可上升到69.7岁,2050年可上升到70.4岁。不言而喻,老年人口年龄中位数的变动主要是受到历史上出生人口数量,尤其是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生育高潮的影响。当这部分人还未达到老年人口较高年龄组时,老年人口年龄中位数偏低;而当这部分人进入老龄较高年龄组,老年人口年龄中位数便跟着提高上来。老年人口年龄中位数的这种变动趋势,亦即老龄化的超老龄化发展,是研究老龄问题时需要引起注意的。因为老年人口中处于中位数以下的一半人口和处于中位数以上的一半人口,在体力、智力和活动能力上是具有明显差别的,因而其生活的自理程度也是具有明显的差别的,是解决老龄问题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一种普遍趋势,它是经济、科学技术进步,人类寿命延长的一种进步标志。不仅如此,从人口再生产角度说,一定程度的老龄化是人口由增长型向稳定型、稳态型过渡所必需的,是实现长期人口规划目标必经的阶段,我们应取积极的态度。但不能因此而忽视老龄化及其所带来的问题。相反,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及超老龄化发展趋势,必须审慎对待,妥善地解决未来多出四五倍的老年人口衣、食、住、行、劳动、学习、医疗、婚姻、娱乐、交往等各种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中,老有所养是第一位的,是解决全部老年人口问题的基础。

老有所养是贯穿每一个老年人后半生始终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时间上,从进入老年期到生命完结,都必须有所养;在空间上,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城乡、地区分布如何,每一个老年人都要有所养,是老年人口生命延续和一切活动的基础。特别是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不高,在饥饿、温饱、小康、富裕四个阶段中处于温饱阶段,本世纪末只能达到小康水平,下一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水平也不可能很高,决定了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解决全部老年人口的老有所养仍旧是当务之急。

当前,我国的养老方式可以粗略的划分成两大类:一类包括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多数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少数农村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在内的定期领取离退休金制度;另一类是多数农民、城镇个体手工业者和少数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无离退休金,主要依靠子女抚养

和社会救济。这两类人员所占的比例，按现在在业人员划分前者约占30%，后者约占70%。无疑，约有30%的社会劳动者能够拿到离退休金，使老年生活有了可靠的保证，拿不到离退休金的人确有困难也可以得到某种照顾，对比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老年生活更无保障，有着天壤之别，是巨大的社会进步。然而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同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走向老龄化的矛盾，也是很突出的。主要的，一是同离退休金猛增的矛盾。1952年全民所有制单位支付的劳保福利费为9.5亿元，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4.0%；1985年上升到266.8亿元，33年间增长27.1倍，占工资总额的比例也提高到25.1%。职工劳保福利费中包括丧葬、医疗、困难补助等内容，但离退休费所占比例最大，1985年占42.1%。今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到来和离退休人数的大量增加，每个职工离退休费用水平的提高，有关方面预计国家支付的离退休金2000年将比目前增长2倍以上，2030年将比2000年再增长10倍，占工资总额的比例也将上升很快，形成难以支付的巨大财政压力。一般认为，支付老年人口的费用占到国民收入的24%为“警戒线”，超过这个“警戒线”将给国家财政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困难，西欧、北欧的一些国家就是前车之鉴。二是同经济技术进步的矛盾。当前一般由职工所在单位支付离退休金，这对于那些职工队伍老化、设备老化、产品老化的企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严重地阻碍着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进步。同时就全社会来说，职工个人不付任何费用便能领到离退休金的老年保障制度，不利于个人储蓄和国家集资，妨碍扩大投资和改进技术。三是不利于缩小城乡差别，特别是相对说来生活上保障程度更低一些的乡村老年人口，老有所养问题更多一些。四是不利于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的增长。因为多数劳动者尤其是广大农民没有老年生活保障，难解缺儿少女的后顾之忧，多生多育、养儿防老也就成了他们的一种办法。五是同家庭小型化的矛盾。我国有着敬老、养老的传统，目前三代人的养老式家庭仍旧占有很大比重。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职业变动和人口流动的增加，传统观念的改变，老年夫妇户、孤寡老人户比例上升，老年社会保障亟待加强。

解决上述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明确我国老年社会保障的基本方针，积极推进改革。在战略上，我以为，一方面要发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养老的优良传统，发挥传统养老方式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实行对全体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险，改革老年社会保障制度。方向是在达到退休年龄前三二十年，最好是从一个人一走上工作岗位就开始，由个人、所在单位和国家三方集资设置老年年金，待年老退休时专款发给。这是一项相当细致、极其复杂的工作。美国从罗斯福执政设置老年年金，中经增设遗嘱年金和伤残年金，补充随工资和物价浮动的规定，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完善起来。我们要赶在比较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到来之前完成这项工作，就要从现在起着手改革，及早制订方略，贯彻实施。

从属年龄比变动和经济发展速度

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每个生产年龄人口负担的未成年和老年人口之比，即从属年龄比的变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前面的预测表明，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将一直上升到2010年左右，然后才缓慢下降，它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口从属年龄比的降低，直至2010年以后才略有提高。以中位预测为例，从属年龄比的具体变动情况

是：1982年为62.3%，1990年为46.2%，2000年为45.3%，2010年为40.1%，2020年为45.8%，2030年为50.6%，2040年为58.0%，2050年为57.5%。这种情况表明，尽管未来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增加比较迅速，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也比较快，但它抵不过少年人口数量的减少和所占比例的降低，从而导至人口从属年龄比的下降。下一个世纪一二十年代后从属年龄比虽有回升，但直至2040年老龄化最严重、从属年龄比回升最高水平时，也只有58.0%，还略低于目前的实际水平。

这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它对研究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怎样估量从属年龄比降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当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不尽一致，但几年来我一直坚持认为，我国面临的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总的说来利大于弊，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把经济的发展速度搞得更快一些。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下降是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到来而发生的，说明少年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和所占比例的下降更为迅速，因而国家每年用于未成年人口的消费可以大大节约一笔出来。据估计，1990年以后每年可以减少100亿元以上，未来二三十年内将节约几千亿元，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毫无疑问，这笔资金如用在发展生产、改进技术装备上，将对实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和加速四化进程，起重要作用。

其次，对生产年龄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也要作历史的和辩证的分析。就一方面说，鉴于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就业压力大，以致不得不加快就业战略重点的转移，扩大就业与提高就业效益的矛盾仍很突出，今后生产年龄人口最好不再继续增长，如能减少一些更好。然而由目前我国人口年龄构成比较轻，具有较强增长势能的基本态势所决定，未来二三十年内总人口要继续增长，生产年龄人口要增长更快一些，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有通过降低生育率减慢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因而也就减少了生产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例上升的程度。所以，我们在大力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必须正视生产年龄人口大幅度上升的客观必然性，把生产年龄人口充分有效地利用起来。事实上，世界特别是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经验表明，利用好本国廉价的劳动力，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是经济高速度成长的重要条件之一，日本、新加坡等就是例证。在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二三十年内我国从属年龄比大幅度下降，生产年龄人口多，需要负担的少年和老年人口之和占的比例小，是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实现翻两番的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要把握住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这一有利时机，吸取国内外特别是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近年来的新鲜经验，沿着改革、开放、搞活的路子，把充裕的人力资源挖掘出来，科学地利用起来，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